

特别策划

# 88

# 美元的自行车

一年前，我的兄弟杰瑞德和我们的朋友尼克，还有我，创立了“88美元自行车”（88bikes，www.88bikes.com）。88bikes致力于在发展中国国家里选择一个山村或二所学校或一所孤儿院，向所有的孩子捐赠自行车。我们帮忙建一个现场，自行车店，还会组织一个自行车修理培训。去年是在柬埔寨的一个孤儿院，今年是乌干达的帕东哥难民营学校。

文图并 董强 (Dong Qiang) 译/陈子

我们一直雇佣当地的工人进行自行车的组装，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更熟悉当地情况，也还希望可以给他们增加一些收入。



“吉卢(Gulu)没有汽油。”吉米(Jimmy)说。杰瑞德(Jared)和我把头从Daily Monitor(乌干达当地两大英文报纸之一)上抬起来:124人死于肯尼亚(Kenya)暴乱。

“那我们怎么办?”我说。

吉米提起两个简便油桶放入他自己的RAV4越野车的后面。“今天早上五点我去了一趟营房,拜访了我的将军老友。他从他的私人配给里拿出了四十升汽油给我,足够我们到达帕东哥(Patongo)。”

“那太好了!”我说,“但是回来呢?”

“回来……”吉米瞥了一眼,貌似他是第一次想到这个问题,“不知道。”

在新年的第一缕阳光中,我们站在吉卢一家自行车店的外面。日光耀眼,即便是在穿过柴油机排出的紫色雾气和清晨的袅袅炊烟后,新年的阳光仍然是明亮和清透的。

十个身着蓝色连衣裤工作服的人已经在商店集合了。“这些是我们的机械师。”吉米说。“他们将和我们一起去帕东哥。”

“新年快乐。”他们说。

一辆载货卡车在吉米的RAV4后面隆隆作响。“路况不太好。”司机耸了耸肩说。

“他开了一整夜才到这儿。”吉米说到。

防水帆布覆盖的卡车上五十个箱子,每个都重达50公斤,每个箱子里有四辆未组装的自行车。他们昨天早上在坎帕拉(Kampala)一个自行车商店把这些箱子装上车的。大家扛着箱子躬身前行,腰快弯成了九十度,流油的汗水在他们的脸上刻出了小河。

“不早了。”吉米说。

师傅们爬进卡车的后面,杰瑞德和我跳进吉米的RAV4里。载货卡车颠簸着前进。师傅们挥手告别。吉米把车开进了一个加油站,跟服务员聊了几句。“还是没有汽油,而且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没有人知道。”

乌干达的石油、汽油,和几乎所有其它物资都经由肯尼亚的蒙巴萨(Mombasa)港运送进来。油罐卡车借由一条主干道在两国之间穿行运送汽油和柴油。肯尼亚、乌干达、布隆迪和卢旺达都依赖于它。然而也因为过度使用,路面已经有点破坏了,柏油路的碎石子把路面豁出了许多坑坑洼洼的地方。但是,对于当地的亿万人民来说,它就是生命线。在暴乱之前,水路虽然慢一点但什么都可以运。但



是现在,什么物资都进不来。肯尼亚总统姆瓦伊·齐贝吉(Mwai Mubaki)惹人争议的再次当选使得整个国家陷入动荡,种族分裂恶化,也把内罗毕和基苏木的混乱局势推进了一大步。没有人知道暴乱什么时候结束。

吉卢落在了我们身后,小屋和商店都慢慢隐退在被连绵不断的灌木和偶尔一见的合欢树覆盖的小山中。“没准儿回来我们会经过他的房子。”吉米说。

我们知道他在指谁的房子,是约瑟夫·柯尼(Joseph Kony),乌干达反叛组织主抵抗军(LRA)的创始人,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你看到远处那座小山了吗?”过了一会

(上)组装自行车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容易  
(右上)我们在柬埔寨的活动吸引了大量小朋友来到现场。  
(右下)我和搭档的合作关系从来都是非常融洽。

儿吉米说道,“他说那是上帝跟他讲话的地方。你相信上帝跟他讲话吗?我不信。”

柯尼现在藏在刚果,非洲和国际社会都要对他的战争罪行进行审判。看来,他再也没有机会干那些谋杀、绑架和组织恐怖行动的事儿了。

“但当局势如此动荡的时候,”吉米的声音带着一丝焦虑和颤抖,“在短时间内情况就会变得再度危险起来。”他指能谋危机会使整个国家骤然紧张。

杰瑞德和我发现,有点讽刺意味的是,每一年我们“\$8美元自行车”项目选中的地区都正处于能源危机中,所有都是,也许它有着某种特别的预知力……我就忍不住想如果我们继续在非洲选择项目地点,我们会再一次看到这样的情景。也许下一次,我们该找个离家近点儿的地方。

“你看见那辆车了吗?”吉米指着路边烧剩的残壳说。此时我们已经开了好几个小时了。“2004年反叛军烧了这辆车并杀害了旅客,这条路过去一直很危险。”

路的一端突然陷入一块凹地,连接到河上的一座木桥。反衬着灰蓝的天空和白

黄的灌木,在烈日的阳光下,许多孩子笑着嬉闹着激起水花,在河面上营造了一幅美丽动人的伊甸园画面。

“汽车爆炸只是个开始。”吉米继续说,眼睛还扫了一眼河边,向孩子们挥了挥手。“叛军还会到村子里绑架这些孩子,杀害他们的父母,使他们成为儿童士兵或者性奴。”

十年前吉米自己曾被反叛军绑架过。九个月后他成功逃脱,从那以后,他在北乌干达甚至国外为其他幸存者而奔走。吉米是一个“中介人”,是我们到乌干达偏远的帕德省的随行保镖,那个地区还没有旅行者去过。

“随着战争愈演愈烈,”当我们爬上河对



岸的一个陡坡,吉米说,“人们被迫离家来到营地。”帕东哥的孩子就在那些难民中,他们正在学校等着我们。

吉米在主楼旁的阿拉伯胶树的树荫下把车停下,很多孩子立刻把我们围了起来。我们在尘土飞扬中开了五个小时才从吉卢到了这儿。显然,孩子们已经听说自行车在运来的路上了,而且都在等着看这是不是真的。载货车就跟在我们后面,车一倒进学校的操场,伙计们就瘫坐在树荫下。正是炎热的午后时分,这趟行程已使他们精疲力尽。

“谢谢你们能来,”一位穿着亮紫色衣服的女士,带着认真的眼神和热切的笑容说到。

“我们一直在等你们。”她的名字是玛丽·伊丽莎白,音乐和戏剧老师。通过她的努力,几年前,这些有着同样遭遇的孩子们参加了一个在坎帕拉举行的全国音乐舞蹈比赛,同国内其它地区的孩子们一起比赛。北部地区的难民儿童为了至高的荣誉,在全国比赛的舞台上同南部城市的孩子一起比赛,这场景一直被认为是不可可能的,然而,孩子们以最好的表现感染了每一位观众。我的朋友肖恩(Sean)让这个故事故成了他的电影《战与舞》的主题,最初也是我把帕东哥介绍给他的。

“对孩子们来讲,今天是个大日子,”当我们和其他几位老师握手后走进校长办公室的时候她继续说到。

“你们认为一辆自行车对孩子们意味着什么?”我问道。

“一辆自行车意味着……”他们想了一下。“一辆自行车将改变他们的生活。”玛丽·伊丽莎白说。

帕东哥保护营学校在市区的郊外,正好挨着大草原。学校有很多水泥房子,围成了一个中间有块空地的不完整的长方形。我们一到,来帮忙的村民就把装自行车的箱子卸到地上了。也是在这儿,自行车的组装工作将在第二天早上开始。房子是黄色的,但是油漆很早之前就褪色和碎裂了。墙上的插图很详细,而且其中(据杰瑞德说)有几幅是眼睛、骨骼系统和内脏的精确图解。就象乌干达的其它地区,战争明显地阻止了艾滋病的传播趋势,学校到处都能看到提倡禁欲的标志。教室很空,没有椅子,没有桌子,只有水泥墙上几乎快分辨不出的古老的粉笔板。



老师们带我们参观了学校，新年第一天里学校是出奇安静，然后我们驱车进了城。

帕东哥，像我们之前看到的所有IDP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国内流离失所者) 一样，由数不清的泥和茅草搭建的圆形的小屋组成。修建这些棚屋的最初意图本是作临时避难所用，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很可能永久住在这儿。整个家庭——有时候好几个家庭——居住在这些狭小的空间里，有的家甚至也就(而且几乎，很可能，更小)纽约城那种只有一个小房间的公寓那么大。六万难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把帕东哥称为家，而整个北乌干达有许多像帕东哥这样的难民营。

吉米把车停在我们位于城市中间的旅馆，然后我们沿着帕东哥的一条主要街道步行，一条凹凸不平的狭长土路，路两边是被阳光几乎烤干了的混凝土房子。

除了贫穷，整条街有一种大家庭的气氛，特别是黄昏晚些时候，当气温下降，太阳沉入到金色的暮霭中时，整条街就成了“帕东哥的香榭丽舍大街！”一条有着难民文化的拥挤的、气氛活跃的、熙熙攘攘的大街。

“在经历了这么多不愉快的事情后，你们是怎么保持这样轻松的心态的？”那天晚上当我们看到人群从“帕东哥旅馆”的走廊漫步出来闲逛时问到。

“我们的文化，”吉米说，“这是我们遗留下来的仅有的东西。”

因为旅馆就是为了给救援人员和军队住而建的，所以我们住的旅馆是帕东哥唯一的旅馆，而且我们是唯一的客人。据我所知，它有帕东哥唯一的发电机，唯一的电视，和仅有的台球桌。没有自来水，但房间是干净的。那天晚上，为能挤进电视厅观看一场足球比赛当地人要付五百先令(合三十美分左右)。当我们进去凑热闹的时候，有至少六七个体育迷邀请我们到前排去。足球赛完了，我们就打弹子。许多孩子挤上铁制的围墙，每当我们丢球时(这经常发生)就哄笑起来。发电机很早就罢工了，这还得感激汽油危机。整个村子都陷入了黑暗。巨大的黑暗席卷而来的时候我们正站在走廊上，星星好像一下布满了整个天空。这一切来得如此突然而彻底，天空突然像又开始呼吸了一样。许许多多炉火打破了黑暗，就我们视线所及的距离——火光一直到



苏丹！一直到刚果！我们听到四周所有的家里都传来讲故事，唱歌和围在夜晚的炉火旁跳舞的声音。

在我们抵达学校的第二天一大早，师傅们就开始工作了。两百个车架，四百个车轮，四百个车胎，两百个车把，以及几千个辐条堆在校园里。装辐条的伙计在往车圈上拧螺丝，他紧挨着装车把的家伙，装车把的家伙挨着装车架的家伙，坐在一块儿枯草地上的小树下，装曲轴的伙计正在把脚踏板往上粘，他旁边就是一堆银光闪闪的自行车曲轴。

老师们已经在，主管负责人也在，还有一个本地的政府官员和其他几个人。这才上午八点啊！消息已经传开了。

“我们要去邀请每一个人！”校长说。“我们要邀请整个地区的负责人，在学校

(上)无论到哪里，我都会成为孩子王。(右)在正式发放自行车之前，总是不缺少一个极具“正式感”的仪式。

上课的老师，社区的代表，政府官员……”杰瑞德和我互相看了一眼。天，这得花好几天！“我们最好还是快点儿。”他说。

不想让任何人不快(实际上是免于要耗费掉昂贵的汽油)，我们把高级指挥官请上了吉米的RAV4，甚至让他坐在前面，他很高兴地接受了。我们驱车从一个营地到另一个营地，沿途拜访老师、督学、市长，以及老朋友……就在我们以为已经拜访了所有可能的人时，指挥官记起还有另外一个人我们没去看呢。最后我们到了地区负责人在村子里的整洁的家里，距离帕东哥一个小时的车程。

“为什么我们不知道这个消息？”我们坐



在外面的院子里时，他有些责问地说到，院子被打扫得一尘不染。“我们必须得有个庆典！孩子们要唱歌跳舞！你们给了他们一个非常棒的礼物！什么时候分发自行车？”

“好吧。”我说，尽可能保持一种低调地声音，“我想我们大概会在……这个下午，送出第一辆自行车。”

“这个下午！”这位长官倚靠在他的凳子上，盯着我们，好像不太确定该拿我们怎么办。“你们是美国人，所以你们可能不明白，但这是非洲，有我们对待这些事的方式，这是一种礼仪……”这听起来不是个好消息。然后他笑了笑。“我去过美国。我知道美国人的节奏总是很快。在非洲，我们不像你们那样担心时间问题，而且你们也必须尊重这一点。但是你们这份礼

物在一个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时刻来到了，我们会充满感激地接受。现在是新年，充满希望的时刻，你们会得到我们的祝福的。”

花了好几个小时才回到帕东哥。因为沿途要接受各个不同级别的领导人的祝福，这一路消耗掉了我们大多数汽油。伙计们的工作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十个车架子刚放在外面等着装车轮、车胎和车链。大功初告成。这才下午早些时候，学校已经聚集了一大群人。

老师们在阴凉的地方摆了一张桌子，还拿着孩子们的名单和一套带捐赠人照片的卡片。在我们身后是大省的管铜乐队，主持“庆典”的包括主管负责人、督学、校长伊格内修斯(Ignatius)和一些政府官员。伊格内修斯用英语和阿乔利语(当地部落的语言)欢迎大

家，孩子们唱了歌，还有祷告，然后每个官员都发了言。这就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最后一位官员把现场交还给伊格内修斯——他比这里所有其他人都高出一个脚掌那么多，他用低沉地声音念了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多米尼克阿克纳(Dominic Akena)！多米尼克阿克纳！你在这儿吗？”

每个人都向四周看去，然后，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儿从人群中站了起来。“用这辆自行车帮助你的家人，希望你开心。”多米尼克在纸上签名的时候伊格内修斯对他说。杰瑞德问他长大了想做什么。“当一名医生。”他说。“不错的选择。”杰瑞德说，他自己就是一个儿科医师。然后我把他领到他的新自行车那儿，递给他一张捐赠人的照片。“这就是送给你自行车的人。”我说。“她的名字是桑德拉



(Sandra)。”卡片的背面是世界地图。我指给多米尼克看乌干达在哪儿，然后用我的夏比牌在桑德拉生活的城市-纽约城作了一个标记。“很远，嗯哼？”他仔细看了看照片和地图然后问到桑德拉是否想过来乌干达。

就像这样，幸福时刻开始了。88bikes以尼克称之为“细小慈善”的方式运作。一个人捐一辆自行车给一个孩子。自行车的花费是88美元(运费和管理费由我们出)。捐赠人提交一张照片，照片会和自行车一起送给孩子。照片的背面是一幅世界地图。我们会把捐赠人居住的地方指给孩子们看——可能是纽约(New York)或者西雅图(Seattle)或者阿姆斯特丹(Amsterdam)。我们把孩子们拿着捐赠人照片的样子拍下来，然后寄回给捐赠人。世界在这时候变小了！

整个下午我们都在发自行车。甘居幕后的师傅们把车铃、车座都装上后，还试图继续工作。夜晚来临孩子们都回家的时候，我们已经发出了一百多辆自行车。

难民文化的许多东西让我们感到震惊。一个就是对生命顽强的赞美，足球赛时球迷的呐喊让旅馆都在摇晃，还有“帕东哥香蕉聚会”的节日气氛，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吉米是对的：人们已经发现了聚集在一起所能产生的安慰，而且由于聚在一起或彼此交流，是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惊喜背后的驱动力。

在乌干达，像大多数东非和发展中国家一样，基础型号的手机价格很便宜，用户自己充值。这儿没有话费计划，没有Rav5s(一种流行的话费计划)，没有免费的晚间和周末时段。这种方式使得大多数人都能买得起手机，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帕东哥的许多人都用手机。“这就带你去看看人们有多么重视通讯。”杰瑞德说。

整个“香蕉聚会大街”有至少十二家商店贴有那种小小的、黄色的MTN(乌干达的三大手机供应商之一)招牌广告。这些广告上说，你可以在这儿充值话费，获得一个MTN手机。

那个晚上，我从帕东哥旅馆打电话给身在纽约的尼克。“尼克，你不会相信这个的，但是我正在营地打电话给你。”

“他们是不是有一条到战场的战地运输线？”他直接问。

所有的孩子都乐意拿着自行车捐赠人的照片进行拍照，这一点对于受捐的孩子以及捐赠者而言，都是莫大的快乐。

“不，尼克。”我说，“我在用手机。”  
“别开玩笑。”  
“我没有。”

据我所知，城里连一台电脑都没有，没有因特网连接，甚至再没有第二台发电机，大小城镇都加起来，最近的城市只有古卢，离这里有五小时车程。然而，我们竟然可以用手机往纽约打电话！而且声音非常清楚。在这本书，《贫穷的终结》里，杰弗瑞·萨克斯(Jeffrey Sachs)探讨了对任何一个深陷贫困之中的人(每天维系生活费用在一美元以下的)来讲最困难的一步是走上复苏之路的第一步。看起来在帕东哥这一步已经出现了，“而且是由手机开始的！”杰瑞德滔滔不绝地说。

第二天早上我们抵达学校的时候，校园里很热闹。伊格内修斯热情地跟每一个人打招呼，“幸福时刻”仍在继续。

像之前那样，我们会问每一个孩子长大以后他们想做什么。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有一个很雄心勃勃的目标：医生、律师、教师，有两个说飞行员，有几个说议员……从海地的太子港到南达科塔的松岭，我因为做电影项目也和很多孩子们交谈过。我也看到过同样鼓舞人心的乐观。一个女孩说她想成为一个白人。所有人都笑了——除了杰瑞德和我。

但是，最感动我们的是最后一个拿到自行车的男孩。事实上他应该第一天就收到自行车，但是他那天没在现场。后来我们知道，前一天晚上老师们专门派了一个人去找他。

“沃尔特·欧肯(Walter Ocan)？沃尔特·欧肯，你在这儿吗？”老师用低沉、浑厚的嗓音念到，声音穿过孩子和大人重重的包围。他的嗓子因为喊了太多名字已经开始嘶哑了。“沃尔特·欧肯？如果你在，快来拿你的自行车。”玛丽·伊丽莎白踮起脚尖，在孩子们的脸上迅速扫描。

然后，一个高高瘦瘦穿着一件破旧T恤的年轻男孩从人群后站了出来，走到桌子前。可以看出，老师们舒了一口气。因为他真的很需要一辆自行车。

沃尔特十五岁。他的父母都在暴乱中去世了。作为最大的孩子，他一边上学一边还要照顾几个年幼的弟妹。这些担子使他昨天无



法过来——而且他今天也差点儿来不了。

沃尔特签了名，连头都没有抬。杰瑞德问他长大了后想做什么。他没有像其他孩子那样，成为飞行员、律师、足球明星，他甚至都没想过这个问题。他只是说：农民。沃尔特对他的未来没有任何幻想——他只是想支撑起整个家庭。我们把自行车交给他，然后给他拍照。呃……那一刻，他脸上的表情，还有他手握车把的样子……是的，你了解的。你知道这样一辆自行车对他意味着太多，即使他无法表达给你——我们或许能理解。

在帮助难民、种族屠杀的牺牲者，和其他生活在极度贫困中的人们时，我觉得人们总是把目光聚焦在帮他们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上。对快乐的需要反而被忽视了。我们厌烦了以这种方式帮助成千上万苦难的人们。为什么？因为我们只是在生计方面替他们考虑。但是只是生存下来会让人踟躇不前，快乐却能让人不断进步。快乐公理是这么说的：能够把最多分量的快乐发掘并释放到全人类中的选择是最好的。这样的行为会推动整个人类的进步。

帕东哥的孩子应该和加拉加斯(Caracus)或磅港(Kampong Cham)或者上东区(Upper East Side)的孩子一样，快乐地生活。快乐之于精神就像水之于身体。这种乐观的文化挽救了这些战争的幸存者，把大家都联结起来，纽带就是快乐。只有意识到快乐是必需的，而且，让人们快乐起来成为援助行动的一部分而得到鼓励的时候，我们才会在消除种族歧视和贫困的道路上有所进展。现在我们认识到，人类对快乐的需要，就如同对食物和庇护的需要一样。

自行车最神奇的地方是，它让你获得快乐的同时也可以用来吃饭。它既是快乐的工具也是赚钱的工具。在美国，你可以骑车探险，也可以骑车送报纸。在乌干达，中国或者越南，可以骑车上学、驮货到市场或者带你去最爱的小池塘游泳。我敢保证你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看到这儿的时候都会想起你的第一辆自行车。我当然记得我的。

当我们收拾好行李，跟孩子们和老师告别，回望古卢的时候，我们一直记得沃尔特脸上的表情。有时候你会问自己，当时间流逝这些真的会在你脑海里留下印记吗？但是当你

经历过那样一个时刻后，你就再也不会担心这个问题了。

但是汽油不够的现实还是很残酷。我们一直试图拦路搭车，马路空空的，几乎找不到可搭便车的卡车，出租车都危险地超载运行。我们驾车穿过一座小村庄，看到拿着机关枪的士兵围着两百个把手举过头顶的人。吉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也停下来问。穿过边境，暴乱没有缓和的迹象。黑市上的汽油价格飙升到25美元一加仑。

也就一时兴起，吉米开车拐进了一个远离城镇的废弃加油站。它看起来跟我们看到过的其它加油站一样已经被荒废。但难以置信的是，这里有汽油！吉米简直疯了。“我想，天使一直在眷顾着你！”他说。我们抽出所有能抽的汽油把油箱加满，回到了古卢。

在回到美国几个星期后，我收到肖恩的一封信。他的电影《战与舞》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的提名。

三天后，尼克和他的妻子，还有我，去参加了纽约城一个乡村的放映会。这是一部令人难以忘怀的电影，尤其当我们认出了几乎所有孩子，这种感觉愈发强烈了。

在每一张捐赠卡片的背面是一幅世界地图和88bikes的标语。你可以去任何地方。看完电影坐在影院里，我意识到，是孩子们的韧性和天赋、老师们的爱、人们的信念，再加上肖恩的技术以及作为一个电影制作人的爱心，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产生了这么多快乐的记忆。当然，也包括两百个自行车捐赠者和两百个孩子之间的故事。我想，也许我们的标语应该改为：“我们”可以去任何地方。”

我们还没有摆脱极度贫困的一个原因，不是因为标准设得太高了，而是太低了。仅仅让这些受苦的人们能生存下去已使我们心生厌倦。我们盼望知道我们的捐赠不仅能养活一个人，还真正改善了他们的生活，帮助他们在生活的道路上不断向前，而且，最重要的是，能帮助他们快乐起来。

如果我们的目标不是摆脱极度贫困，相反地，是极度贫困的副产品——让我们把它称为极度忧伤，我想人们就会不断地给予和付出。我们想让大家知道，这种付出可以让他们快乐，而不仅仅只是让他们能活着。快乐能使人向前。☺